

## 回忆我在伪满时的经历

金名世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汪清县任职，熙洽投敌后，按照伪关东军的旨意组织伪吉林省政府，因我俩同属一宗，关系较密切，因而他打电报给我，要我速赴省。此时，我已从报上得知溥仪到了汤岗子，我推测，溥仪此番来东北必有来头，于是，我将县务交给科长代理，于24日匆匆赴省见熙洽。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于是我被委任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机要秘书。

上任后第一个任务是去哈尔滨联络丁超和张景惠，熙洽希望他们与熙洽合作，以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让我去完成这个任务，是因为我曾在丁超手下当过参谋长。我受命后，急赴哈尔滨，见到了丁超后，我极力游说，申明保存实力以图大计的重要意义。并按照熙洽的旨意许诺丁超做护路军总司令，丁超十分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此行圆满地完成任务，深得熙洽的赏识，于是又让我去北满几次，收拢了东北军的几支部队，充实了熙洽兵力。为此，我捞到了哈尔滨电业局总办这个肥缺。

1932年10月24日，我被委为吉林省警务厅长兼保卫团管理处总办和警官高等学校校长。

警务厅内分为警务、特务、保安、司法、外事、卫生六科，当时警、特两科长是日本人，其它四科长为中国人，但各科配置一名日本人事务官，类似副科长。厅里设日本人警务顾问一员，驻在厅内办公，该顾问由驻吉林的日本宪兵队长儿岛正范

兼任。我到任伊始，立感棘手，因为所有用人行政，完全由日人官吏把持，比较重要公事，不经警务顾问同意，则不能执行，同时吉林警务厅须受吉林省治安维持委员会节制，所谓治安维持委员会，系为驻吉林省日本军最高军部所组织的对吉林全省治安执行机关。该会委员长为日本陆军第十师团参谋长加纳丰寿大佐，该大佐系造成土龙山事件之责任者，为人凶恶，世人皆知。我在任期间所经重要事项如下：

1933年春，伪民政部命令各省要对民间所有枪支进行调查登记，以发枪证，限6个月办理完竣。其命令大致内容为：民间现有枪支，不论在旧政权时代，是否起有执照，均须附带枪支持有人半身像片申请登记，一律发给枪照，倘逾期未请领枪照，而被查出枪支者即视为私藏枪械，依法治罪。接到命令以后，省警务厅和各县警务局几乎专行办理此事，待调查登记完毕，枪照已发，伪满中央则召开警务会议，由警务司指示将来收缴民枪办法。会上警务司司长尾吉五郎乃大放厥词，他说：“日本当年取得台湾时，曾收缴民间武器若干，日韩合并当时收缴朝鲜民间枪支百万支，我认为当时办法尚未彻底，颇有遗患之处，现在满洲散在民间枪支，超过当年台湾朝鲜远甚，应当采取妥切办法。”当时与会者对此反映不一，议论颇多。会议中间准许各警务厅长发言，我虽明知无效，惟以此事关系重大，弄不好会使百姓对政府更加不满，不能不发表意见，于是我说：建设王道乐土，应当首先安定人心。古人有言，安民可与行义，危民易与为非，今建国未久，人心未定，如果骤缴民枪，易生影响，将来办理，宜分年限，宜分地域，希望中央考虑。话虽说了，可此次会议后，伪政府即正式发令，收缴全部民枪，并公布有名无实之枪价，以及藏匿不缴惩罚之办法。此后，吉林省在治安维持会督饬之下，数月之间，即收缴完毕，由各县分别解交於

治安维持委员会，或直接解交当地日本军部队。

我任警务厅长约近10个月，对于调动警察团队，虽然警务顾问每多掣肘，然尚未发生统帅权之问题。迨1933年8月间，吉林高等检察厅长臧尔寿忽于夜间11时，被土匪侵入宅第，将其本人及其两子绑走。当时闻报，即夜调派省警卫队，分为四队出发，跟踪追剿，以期将人票救回。彼时适值永吉县保卫总队正在县境游击，连夜命令该队堵击，并以电话命令四乡警察署出动搜索，于第二日下午2时左右，由永吉保卫总队在官马山山岳地带与该股土匪接仗，将臧尔寿及其一子救回。孰料此案发生后之翌晨我一到厅，警务顾问兼吉林日本宪兵队长林清就严词质问我昨夜何人将省警卫队派出四队，追剿土匪今尚未归？我急告以高等检察厅长被绑及我所采取的紧急措施。而该顾问大不以为然。且明言警务厅长并无警察统帅权，引为重大问题。我当时很气愤，乃质问他：警务厅长无有警察统帅权，不知载在某种法令上？该顾问不满，悻悻而去。当日晚车，即赴新京，未出数日省公署收到国务院秘令，内言满洲国警察统帅权属于宪警统制委员会委员长。而该委员长则为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吉林警务厅长并无警察统帅权。并在其中大加申斥，言称嗣后倘有擅自行使统帅权者定予严惩。由此才明了警察统帅权之所属，始知由宪警统制委员会这一不公开机关操纵伪满之警察实权。

1934年3月吉林省治安维持委员会在哈尔滨开会，会场设在日满俱乐部内。入席伊始，首先由委员长加纳丰寿大佐激烈言说吉林省长熙洽，豢养私兵、扶植势力，俨同旧日东北军阀，所有吉林省公署警卫队及各县保卫队，应即解散改编，由吉林警务顾问林清、总务厅长三浦碌郎切实负责、迅速办理。我因责任所在，乃起立发言，我说：关于吉林省公署警卫队，系由省政府卫队团所改编，担任省城治安，至于各县保卫总队，是

地方出经费，为保卫当县治安剿办土匪的部队，历史甚久，并非熙省长个人之私兵，如果治安恢复，地方安谧，自可裁遣。加纳大佐闻听，声色俱厉，言称吉林省治安，完全由日本军担负，吉林省公署仅可办理行政事宜，所以警卫队和各县保安队，应迅速裁编。当日北满特别区特警处长金荣桂亦为与会之一员，散会后曾劝我，不要捋虎尾以招祸。此次会议回来不久，该治安维持委员会即有正式指标将吉林省警卫队裁撤，该队编制全体官兵共为3 000人，当由省公署每人发给三个月薪饷而遣散；关于保卫队方面，则将吉林全省保卫团管理处取消，所有职员分别给资遣散，各县保卫总队，一律缩编为警察队，大县约留百名，小县为50名，较之旧日保卫总队的编制、装备兵力，不啻霄壤。同时治安维持委员会认为当时商工业之自警人员及农村自卫团亦为职业武装团体，命令一律解散。

1934年伪满改革地方行政制度，将旧日东北四省划为十省，订于当年12月1日新省开厅办事，而旧省同时撤销，我被任命为伪三江省长。当时三江省之组织，内分总务、民政、警务、教育4厅，下辖14县。新省成立当时，日本军驻扎为一个联队，联队长田村元一，驻在佳木斯，伪满军则为依兰地区警备司令所部军队，由该两方部队担当三江省治安责任。

我到佳木斯后，据地方人报告，当街有赌局两处，输赢甚大，不但当街人被害非浅，即附近村屯，因之荡产，堕落者实繁有徒。我听报后当即派人查明宝局一处，会局一处，均在戏园后院，系为日本宪兵队所包庇许可，即命警务厅长负责，与日本宪兵队联络，迅为取消，而宪兵队答称对该赌局之许可，原为兴通市面，并曾由该赌局捐款6万元兴修旧市街马路，应当从缓取消。且另一方面使剧园男女伶人及赌棍流氓约六七十人，到我住所，请愿保留，以维生活。当经恳切告以利害，说明新

省成立，绝对不能允许公开赌博，如果生活实在困难，报名由省代为介绍职业。并复命警务厅长负责与宪兵队及日本军联队长接洽，于两个月内将该赌局取消，同时通令全省有赌局之县份，一体查禁解散之。

1936年1月中旬，三江省召开全省第一次县长会议，我于会议席上说明省政方针，在于建设王道乐土、廉洁政治、保卫人民、严禁贪污各节，并指示，目前省政当务之急在于安抚人心，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是各县长之基本责任。接着由各厅长就其所管部门，加以详细指示说明，同时各县长亦先后报告本县行政状况、治安状况，大致加以讨论研究，会议共为三日。自此以后，每年举行县长会议一次，多半在本年春季。

1936年6月的一日总务厅长樋口光雄，突然对我说目前胡匪曾一度攻入通河县城，而县长王知津不力为抵抗，日本军认为有通匪之嫌，要予逮捕。我闻言，甚为不然，乃力言绝对不致有此种事情，并且该县长之为人，素所深知，当敢以身家相担保，极力主张由省派员前往调查，以明真象，并说如果不经调查，骤由日本军逮捕，不但震动一般人心，而且影响政治前途，希望该总务厅长向日本军接洽，务须由省公署派员调查。但最后是由佳木斯日本宪兵队同警务厅日本人官吏赴县调查，结果自然是嫌疑重大，于是将该县长由通河带回佳木斯日本宪兵队本部、拘押两月，备受折磨。因为始终不承认，方交由省公署免职取保释放。

1936年以后，三江省内日本军逐渐增加，佳木斯驻骑兵旅团，并因图佳线通车的原因，勃利县林口设有日本军第四独立守备队司令部。增此大批军队，其用意显然为三江省治安。当时治安肃正工作搞得乌烟瘴气，秋冬之季，日本军四处讨伐，常以通匪济匪为由，任意焚烧杀戮百姓，为了断绝抗日队伍与老

百姓的联系，不断将零散居民归之一处名为集团部落。我虽然处于愧儡地位，也感到这样作不利于统治百姓，乃就讨伐良民，集团部落两事，屡次催总务厅长樋口光雄向军方陈述行政意见，樋口虽为日本人，但也觉得我的话有几分道理。故时常向日军骑兵旅团代达意见，并对我吐露实情，言说关东军认为三江治安不良，故拟进行初步治安肃正工作，我以日本人立场，不便深言，你可与小林中将（当时三江日本军最高司令官）恳谈，很有必要。我乃亲赴林口，会见日本军第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小林角太郎中将，对当时所谓胡匪经过村落人民有一饭之供给，一宿之停留，日本军则认为通匪济匪，任意烧杀之事，痛切说明，此为国家政治力量之不足，不能保护人民之所致，而人民根本无罪，即遭胡匪抚害，无处申冤，反认为通匪济匪，致受惩治，此所谓不死于胡匪，而死于官兵，势必使弱者逃亡四散，强者起而走险，与胡匪合流。当以个人为例，如果身居穷乡僻壤，处此境遇，只好如此做去。该小林中将为之动容，又说至于集团部落一事，对于被集团人民，虽然名义发给款项，但为数无几，实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所有新家屋建筑材料、所需费用、及集团后新部落附近土地是否足够该部落人民耕种，均为重要问题，如接近山岳地带当时非办集团部落不可者，固无论矣，其归与不归均可者，如不归并，则能减少人民许多痛苦。对此种种痛述无遗，该小林司令官闻听之后，对我颇为敷衍，并言彼系军人，只能执行上级命令。但个人初次到满，对于地方情况，诸多生疏，以所谈各节，认为出于肺腑之言，必为考虑，令其部下注意等语。我当时虽然明知此行为无异与虎谋皮，难期成功，但为良知所驱使乃不能不这样做。

第二年春季3月我被伪省政府派赴日本视察行政。共为两个月，于5月中旬回省后，则见佳木斯开来日本军松井师团，并

其所部军队陆续前来，分赴各县，此时传有军政统合之说，对三江省治安要实行大讨伐，适于此时伪满政府发来内命，调我为热河省长。而三江省长由政府特任第四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激兼任，所传军政统合之事，乃实现矣，我于7月2日离佳木斯赴热河。

我到热河任省长后，适为“七·七”事变之际，大批日军经承德赴古北口，侵入平津，时将省公署作为过往军部休息食宿之所。所以满目皆乱哄哄的景象。当时热河省次长为日本人连修，官房四科长概为日本人，警务厅长为日本人中野四郎，民生及实业两厅则为中国人，各厅科长日本人占多数，并且皆为重要科。热河省所辖13县，6旗，为蒙汉民族杂处之区。

热河地域，山岭重叠，可耕土地甚少，地瘠民贫，前清时代，即为协绥省份，民国以后，协绥无着，于是历次军阀政权大肆种罂粟，生产鸦片，以维持政费，并填其个人发财欲壑。伪国建立后，虽标榜“王道”，建设“乐土”，其实日本侵略者所施，完全为强盗政策，大利所在，焉能废除，故热河仍旧栽种罂粟，由中央专卖公署管理此事，于热河设有专卖署，管理种烟等事，对于种烟人民，施行合法化的榨取、残虐。1938年，即我到任的第二年，关东军为欺瞒世人耳目，乃令伪政府宣布十年断禁鸦片政策，中央设置禁烟总局、热河省公署民生厅设烟政科、热河各县设置烟政股，对于种烟收烟各事，划归热省办理，当时热河行政机构中烟政科为重要部门。十年断禁政策施行当时，栽培区域指定热河省及兴安西省的一部地区，其他地带，一概不准栽种。当时热河栽培土地数约近五六十万亩，发给住户栽种执照，按土地等级定出烟的产量，关于收烟的价格，完全由伪满中央指定。专卖署管理时期，缉私队行动活跃，残暴无比。

按照鸦片十年断禁政策规定，栽培面积应每年递减；即按第一年度所定栽培面积亩数，由第二年度起按年减若干万亩，至第八年度减完为止，以后就不栽种罂粟了，同时伪满鸦片瘾者，至此时期则应完全戒除。但事实却大谬不然，自所谓大东亚战争爆发后，对于鸦片的需要量骤然增大，日伪政府极感重要，不但热河栽培面积未能减少，并且指定奉天、吉林、四平三省为新集团栽培地域，而鸦片瘾者在断禁施行当时登记数目为98万人，至1944年度，表面上虽然已戒除50万人，但据初步调查，热河一省未登记而私吸者约有数十万之多。鸦片十年断禁政策的实行，不但没有禁住吸毒，反而使吸毒合法化了，而且日伪政府及有关人员，也藉此发了一笔烟财。

热河省东部地区，则为喀喇沁中、左、右三旗，北部地域，则为翁牛特左、右两旗，而东北部地域则为敖汉旗，所有各旗土地所有权，概归旧日蒙古王公所有。伪满建国后，热河即设置土地整理局，为省公署之外局，当时派有日人局长汉川敏男，始着手整理此项蒙地，于1939年整理完竣，乃囑使各蒙古王公以自动名义，将个人所有土地，献纳于国家。约在6月某日，各王公齐集于新京，在国务院举行献纳式，政府接受所献土地，同时对献地各蒙古王公颁给公债若干万元，每人多寡，按旧日爵位而定，以维持其日后生活。

1939年夏季，热河省公署社会科长张实、属官王群、承德商会会长高某等，及各县各阶层知识分子约五六十名，于同一日期突被逮捕。此事发生后，全省人心动摇，个个自危，我即询问省次长三重野廉逮捕原因，据彼当时答云，关于此事，与本省毫无关系，系为锦州高等检查厅与承德地方检查厅会同日本宪兵队所办，一切内容并不详悉。待数日后，复询警务厅长村井矢之助，他说以为锦州高等检查厅与日本宪兵队对于西南



反满抗日铁血团分子加以检举，并言因在本省发生此项重大事件，省长无形中负有相当责任，希望对此不要多过问。我一听，不但营救无望，并且自危，只好默不作声。约有月余，社会科长张实，大概被屡次拷问而灰心，乃于夜间咬破中指血书一大冤字于狱壁，自缢身死。承德地方检查厅通知省公署，于是我派民生厅长高乃济将该科长死尸领回，送伊家中，由省公署为之主持丧事，不久风闻逮捕的其他人均解送锦州。当时目击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1940年5月21日，我调任伪新京特别市长，于6月4日到任亲事。当时市之组织为市长、副市长，下置官房及行政、财务、工务、卫生四处，副市长为日本人关屋梯藏。市下辖机关为长春、大同、顺天、东光、和顺、宽城子六个区（后增东荣一区）及国都建设局，同年10月1日，伪满政府又将首都警察厅划为市之外局。

1942年为伪满建国十周年，正值日军进击南洋得意之际，亦即伪国鼎盛之时，特为粉饰太平，大肆宣传庆祝，而新京特别市首当其冲，今日欢迎，明日欢送，不计其数。4月下旬汪精卫来满祝贺，于他到达新京的第三日，由新京特别市主办，举行首都官民欢迎大会，以南岭综合运动场为式场，参加之官民各团体及学生共2万余人，曾为盛大行事。6月上旬，日本高松宫代表日本天皇也前来祝贺，其欢迎及接待尤为隆重。

为对外夸大宣传起见，还召开了东亚大都市市长会议，以完成其庆祝史上之一页，于是命由新京特别市主办此事，新京、奉天、哈尔滨三都市为主办者，发出请柬，邀当时南京、上海、汉口、青岛、济南、北平、天津等7个市，张家口特别市以及日本东京等21都市，共32个都市，于9月11日起至14日止，共4日，在新京大和旅馆举行大东亚大都市市长会议。开会第一日

纷纷接得日本、汪伪政权、蒙疆各政府之贺电，并给菲律宾、泰国、缅甸各政府发电，希望其参加下次会议。会议开始时，我代表主办省报告筹备经过，及各方提案整理过程后，满场一致推我为议长，于是我就议长座指挥议程，进行议事，爰就日本各都市提案，中国方面提案、张家口特别市提案，以及主办方面之提案，分别加以讨论，圆满进行，付诸表决。并于会议最后一日，通过了各都市今后建设业务，采取彼此互助精神，对于各都市文化积极交流，建立统一情报机关，以及下次会议地点为南京等等议案。当会议闭幕后，市长全体参加9月16日伪满建国十周年祝典大会，并赴吉林、哈尔滨、奉天、抚顺、鞍山各市参观商工业，始行解散。

举行伪满建国十周年庆祝式典后不久，伪满中央及地方人事大更调，我被特任为伪吉林省长，于10月上旬到省亲事。当时吉林省公署之组织，于省长次长之下置警务及民生、警务、开拓、交通四厅。省次长为日本人饭泽重治，下辖16县旗，及吉林、公主岭两市。

我调至吉林之际，正值伪满增加出荷量的盛期，亦为日寇榨取我人力物力达最高阶段，吉林省为谷仓地带，出荷数量占全满五分之一以上，当时人民之负担可云重矣；我到任之日，适为本年度新粮谷开始出荷之时期，省次长饭泽重治曾称省公署已编为四个班，分赴各地区督促出荷正在工作中，要求我赴各县作初度视察，兼对出荷加以激励。我便以两个月时间，遍走16县旗，其在视察两三县后，即洞悉各县当时农民的痛苦。

据当时各县伪县长所云，人民最感痛苦者，是“要第二回”，即出荷完了以后，伪政府认为人民复有盈余，复令出荷，以往曾有要过三次之事。

1944年伪满政府宣传振兴水利，开发东辽河治水工程，拟

在吉林省通阳县赫尔苏地方，建筑东辽河大储水池，将来名为赫尔苏湖，于是收买该村土地约一万垧作为水没用地。惟伪政府对于收买价格，较之时价相差远甚，人民大感痛苦、甚为不安，省次长饭泽重治促我前往宣抚。2月我亲赴该村，召集土地所有者约百名，举行恳谈会，彼此开诚布公，发表意见，对于土地价格、房屋作价并拆除费用、附着物损失费用、坟墓迁出费用以及迁移费用等，加以磋商讨论。回省以后，就该村所要求之最低限度，请省次长向中央申述。最后仍未能以时价付与百姓。

1944年12月15日我特任伪民生部大臣，当时该部设官房及厚生、保健、劳务三司，所辖机关则为禁烟总局、国民勤劳奉公局、厚生研究所。我到任之日正是伪中央机构着手改组之时，即因历年劳役繁兴征调不区之故，伪政府拟强化劳务行政部门，将劳务司及国民勤劳奉公局由民生部提出成立专部，遂于翌年3月12日伪满政府改组，将民生部取消，新置厚生部及勤劳部，同日特任我为厚生部大臣。而厚生部之组织，分为厚生、保健、禁烟三司及官房，此外所机关则为厚生研究所及鸦片断禁协会。在此任内，直到伪满垮台。

回忆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建立伪国，首先解除武装团体，收缴民间枪械，以消灭我东北人民抵抗之实力，继而统制经济，增加出荷，榨取我人力物力，残害我同胞，蹂躏我人权，使称“亲邦”，强令认贼作父，供奉太神，作其万代奴隶，为所欲为，遂杀教育厅长王宾章、孙文敷等，以涣散中国人之团结，造成人人自危，个个孤立，使之不敢言不敢怒，各缄其口，充其傀儡，任其摆布。当是时也，可谓官吏百姓，同受压迫、同被欺侮、同遭榨取，是以当时人人同具朝不保夕之感。而我在此种心态下，却一直做日本侵略者的鹰犬，以效劳于侵略者，回想

起来，真是汗颜。

## 伪奉天市长郑禹

国 裕

### (一)

郑禹，号炎佐，生于1889年8月8日，是郑孝胥的次子。籍贯福建闽侯。幼年随父郑孝胥、母吴氏及家庭教师习学诵诗，攻读四书五经。1905年5月去日本入东京成城中学读书，翌年4月因做体操折臂退学回国医治，同年7月完婚，8月入上海英华书馆攻读英文，历时3年有余。1910年1月至1911年5月，随上海交通大学英人教授麦秀门补习物理、几何、三角。1911年6月随麦秀门去英国，8月考入利物浦大学士本科。10月，辛亥革命爆发。12月25日，宣统下退位诏，清帝国灭亡。郑禹在英国留学之学费不济，遂于1912年1月退学回国。

1912年7月，郑禹入万国函授学校土木科学习，历时3年。1917年3月在商务印书馆营业部充当印刷营业员。1920年2月调任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京华书局协理。1921年2月任经理。1925年6月因与总馆意见合不来辞职。1926年3月任启新洋灰公司上海南部批发所经理。1930年辞职。这时他与李直士筹办的华堂搪瓷公司已经投产。他任常务董事兼管营业。

1931年12月初，郑禹接到郑孝胥从旅顺的来信，叫他立即动身来旅顺。他来到旅顺，郑孝胥向他说：“日本正在与皇上洽谈恢复大清祖业之事。大清复兴在此一举，吾家世代荣蒙皇恩，今须代表宣统皇上与日本方面往商，需要你前来鼎力相助。”郑